

“心理东西本自同”：柯立夫与杨联陞(上)

李若虹

1930年代末,经贾德纳介绍,柯立夫和杨联陞结识,而且出于对历史和语言的共同兴趣,他俩成为了好友,在哈佛远东系(1972年改称东亚系)一起度过了半个世纪。他俩一同离开东亚系的讲台后,见面的机会没有以前多了。杨联陞在1984年8月2日的日记里写着:“梦见柯立夫,或是思念之故。”他还在1985年的春季学期里每周二就他和柯立夫一起吃午餐写日记,寥寥数笔,蕴含了他俩至深的学友之情。

1980年夏,柯立夫和杨联陞两位老先生同时从哈佛大学东亚系退休。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是美国蒙古学的鼻祖,一位研究《蒙古秘史》的专家;杨联陞是一位历史学家,东亚系的第一位华裔资深教授。杨联陞在哈佛任教35年,而柯立夫就更久了,如果算他二战期间在美国海军服役的时间在内,那就长达39年。在哈佛远东系(1972年改称东亚系),他们一起度过了半个世纪。

柯立夫是东亚系系史上唯一从未休过学术假的教授,退休后远住新英格兰北边的新罕布什尔州的阿尔顿镇(Alton, New Hampshire)霍尔孜山(Halls Hill)自己的牧场。杨联陞退休时已从哈佛大学所在的康桥(Cambridge, Massachusetts)挪到北边的阿灵顿镇(Arlington),离学校不远。虽然身体欠佳,但他还是时时来到校园里神学街2号系里给他留着的办公室做研究、会朋友。他俩一同离开东亚系的讲台后,虽然时有联系,但是见面的机会没有以前多了。杨联陞竟在1984年8月2日的日记里写着:“梦见柯立夫,或是思念之故。”

柯立夫喜欢教书,用他自己的话说,世上再没有别的事儿能像教书那样给他带来如此的满足和快乐了。可是各方压力下,1980年他很不情愿地离开了讲堂。那时他的得意门生傅礼初(Joseph Fletcher)已在系里任教多年,此后便接着承担了所有和中国边疆研究有关的课程,可是傅礼初不幸于1984年6月英年早逝,东亚系就没人教满文和蒙文了,于是1985年春季只得把柯立夫请回任教。柯立夫退休四年后,又恢复了教书的常规。他并不计较报酬,每周定时大老远(176公里)从新罕布什尔来康桥上课。这么一来,柯立夫又常有机会和杨联陞在系里见面了。

那段时间,每逢柯立夫从新罕布什尔牧场来康桥上课的那一天,杨联陞的太太宛君(缪钫)一大早就张罗着准备炒饭、饺子,有时杨联陞自己



年轻时的杨联陞与柯立夫

也准备好一个大三明治,带到系里,等柯立夫下课来办公室一起吃午餐。杨联陞在日记里对这一学期和柯立夫见面的细节都有描述。2月5日,柯立夫十二时半下课,与日本学者小林正美(研究道教史的日本学者,任教于早稻田大学,当年正在哈佛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相谈甚欢。那一天,杨联陞带来了饺子、啤酒还有三明治。柯立夫饮啤酒、吃三明治。小林亦饮啤酒。交谈中,柯立夫聊起自己牛马羊成群(每种近30),金毛犬亦不少。为照顾牲口,他不能外出旅行,又谈到新受处理傅礼初留下的藏书之托。二时柯立夫还有一堂课要上,临走前他告诉杨立陞下星期二会再来。一周后,原定十二时半一起就午餐的,可是柯立夫近一时才来。杨联陞一直在办公室等着。他们又一起进餐,又有饺子和啤酒。柯立夫跟杨联陞诉苦,说自己忙与普林斯顿的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等接洽,商议普林斯顿大学购买傅礼初遗留的藏书事宜。他还说,费正清本来说哈佛不要这批藏书的,可是节外生枝,这会儿又出面说服哈佛大学图书馆来接收。两周后,杨联陞七时起,照样特意给柯立夫做一个大三明治和炒饭,带到学校后才知柯立夫不能来。于是把炒饭和啤酒改请了吴文津(当时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接着三个星期,每个星期二杨联陞同样准备午饭带到学校,但是柯立



夫接二连三都不能前来。杨联陞的日记里写道:“(2月26日)柯立夫又不能来,余今日又带炒饭(自吃)。”“(3月5日)柯立夫不知何故,又不能来。”3月12日,他记下:“近七时半起,雨。有时大雨。作两三明治,宛君炒饭。十时半到校(冒大风雨)。柯立夫近午未来,颇令人失望。”于是一直直到4月5日复活节前的星期五,两人才见上面。柯立夫匆匆赶来,说近日太忙,皆为处理傅礼初的藏书一事,以后再和他联络。等柯立夫忙完了这一阵子,从4月16日一直到学期结束,每逢周二,杨联陞都早起,为柯立夫做热炒饭、饺子和三明治等,照常带到学校。他们一边在办公室吃午餐,一边细聊处理傅礼初藏书一事。

以上杨联陞在1985年的春

季学期里每周二就他和柯立夫一起吃午餐写的日记,寥寥数笔,却蕴含了他俩至深的学友之情,而这份情谊可追溯到1930年代末的北平。

相识北平

1938年夏末,柯立夫结束了在巴黎两年的学业,游学欧洲数国后来到了莫斯科,然后坐上跨西伯利亚的国际列车前往哈尔滨。那一年他年仅27岁,作为哈佛大学远东研究专业的一名博士生,第一次来到亚洲,此行的目的地是北平。当他还在欧洲时,很多学者建议,在兵荒马乱之际,他还是选走印度支那的远路或是走经过日本的海路更加安全、可靠,但他还是听从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的建议(他当年从日本留学回莫斯科走的就是这条线路),说是从莫斯科走跨西伯利亚的线路没有问题,从哈尔滨可以转车到北平。柯立夫研究中国边疆语言和历史的漫长学术之旅从此启程。

柯立夫在美国波士顿西南部的尼德姆(Needham)镇长 大,是家里五个兄弟姐妹中的老大。1929年从尼德姆高中毕业后,以学校最优优异成绩得到

奖学金进入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攻读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他在大学里遇到的一位最重要的老师就是大卫·拉铁摩尔(David Lattimore),也就是赖德懋(即欧文·拉铁摩尔, Owen Lattimore)的父亲。老拉铁摩尔不仅教拉丁和希腊文,而且也懂中文,是他激发了柯立夫学中文的兴趣。本科毕业后,他来到哈佛大学的比较语文学系(Comparative Philology)攻读博士学位,进研究生院一年后转入刚刚创办的远东研究的博士项目。从1935年开始,在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下,在叶理绥门下专攻远东语言。

叶理绥于1934年开始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的首任社长和远东系的系主任。哈佛燕京学社是一家私立的基金会,自1928年创办以来,学社全心致力于发展亚洲的人文研究和高等教育,但是创办后的开始几年里社长一职一直空缺。学社董事会曾经力邀胡适来领衔,但遭婉言谢绝。又请当时名振遐迩的汉学大师伯希和(Paul Pelliot)和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从巴黎前来任职,也遭谢绝。经过多方咨询和协商,经伯希和推荐,学社终于在1934年请到了伯希和在巴黎索邦大学和法兰西学院的晚辈同行叶理绥来担任社长。

在叶理绥率领下,哈佛燕京学社资助和发展哈佛大学的

(下转7版) ➡



帝俄时代的西伯利亚铁路示意图。柯立夫听从叶理绥的建议(他当年从日本留学回莫斯科走的就是这条线路),说是从莫斯科走跨西伯利亚的线路没有问题,从哈尔滨可以转车到北平。